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下

朱子大传

◎ 束景南 著



商務印書館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朱子大传

下

束景南 著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北京

目 录

张岱年序	5
陈荣捷序	7
自 序	8
第一章 败落世家的浮沉	1
衰世“圣人”的诞生	1
从尤溪、浦城到都下	12
在建瓯环溪	25
第二章 师事武夷三先生	40
卜居潭溪	40
“三字符”与“昭昭灵灵底禅”	55
由白水、籍溪通向湖湘派	69
第三章 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	81
踏上心学之路	81
通向“牧斋”	95
“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	108
第四章 儒家心态的迷失与复归	122
高士轩中的世俗主簿	122
主县学下的自我反思	136

	“泉南佛国”的朦胧觉醒	149
第五章	从学延平：从主悟到主静	165
	畏垒庵中的理学信徒	165
	“困学”的艰难跋涉	172
	走出“恐闻”	185
第六章	在隆兴北伐与和议的旋流中	199
	师事延平的最后一章	199
	“诋诃百事”的人都抗争	209
	苟安氛围中的自我奋进	220
第七章	从李侗到程颐	235
	清算宗杲一无垢的佛学论战	235
	中和旧说的历程	247
	衡岳之游	258
	中和新说的诞生	277
第八章	寒泉著述：砥砺理学之剑	288
	超然会太极	288
	清算湖湘派的论战	302
	前《四书集注》的经学体系	314
	道统与正统	329
第九章	鼎足分合：朱吕陆三会	344
	寒泉之会	344
	鹅湖之会	355
	三衢之会	368
第十章	丁酉年：生平学问的第一次总结	383

顿进之功	383
《四书集注》经学体系的诞生	397
五经学思想的飞跃	410
第十一章 儒宗在匡庐	421
“见儒者之效”	421
卦事与赈荒	440
从观音寺之会到白鹿洞之会	452
吹向江西的朱学旋风	469
第十二章 浙东提举——道学人格的风采	491
“卧龙”再起	491
六劾唐仲友的人间喜剧	505
浙东的三学角逐	530
第十三章 踰伏武夷山中	557
武夷精舍中的道学夫子	557
在反道学文化逆风中	577
第十四章 全方位的文化论战	597
义利王霸之辩	597
平衡浙学与陆学的道学砥柱	615
通向图书象数的占学	633
第十五章 戊申延和奏事风波	648
“抛却书册去寻春”	648
延和奏事	671
朱林交奏背后的党争	687
第十六章 从传统反思到现实批判	704

	“自无极而为太极”之谜	704
	朱陆太极论战	729
	戊申封事——反思与批判的里程碑	755
第十七章	己酉年：生平学问的第二次总结	776
	先天学与太极说的珠联璧合	776
	离经叛道的新经学体系	789
	人本主义的四书学体系	808
第十八章	南下临漳	824
	在相党纷争的闹剧中出山	824
	“经界”风云	844
	又一次失败的地方更革	857
	南甌民间学术素王	869
第十九章	卜居考亭	882
	横流独抗：与浙学的新论战	882
	朱辛双子星座	906
	“我愿君王法天造”	917
第二十章	二入湖湘	928
	“精密严恕”的长沙百日新政	928
	卷入宫廷内禅闹剧	946
第二十一章	入侍经筵四十六日	957
	“帝王师”入都	957
	一个被新君憎厌的经筵老儒	967
	逐出国门的“天下大老”	982
第二十二章	庆元党禁：在文化专制的炼狱中	995

沧洲精舍——“吾道付沧洲”	995
道学——伪徒——逆党	1007
打入伪籍的逆党之魁	1024
第二十三章 守吾太玄：生平学问的第三次总结 ...	1039
游心于韩文屈赋之间	1039
“空同道士”与周易参同契	1055
经学大师与经学弟子们	1074
第二十四章 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 ...	1091
最后的精神漂泊	1091
道学党魁之死	1104
尾 声 回到多维文化视野	1113
后 记	1120
 主要征引参考书目	1126
后 跋	1142

第十三章 踰伏武夷山中

武夷精舍中的道学夫子

当朱熹从浙东刚回到潭溪，一场从朝中掀起的反道学风波已呼啸接踵而至。他在给陈俊卿信中说：“除书朝下，章劾夕闻”。（《后村大全集》卷一百零一《朱文公与陈丞相书》）表面上朝廷还在催他赴任，甚至还准予把他的江西提刑同梁总的江东提刑对调，实际朝廷上下一片反道学的叫嚣已使他感到森然可怖。六劾唐仲友在赴脊疾视清议独断自用的帝王心态中只留下了一种对“福建子”畸形的憎厌：他把福建人朱熹奏劾唐仲友同福建人龚茂良弹击曾觌、谢廓然奇妙地联想到一起，得出了凡福建人都是不可信用的坏人的结论，以至当淳熙九年九月二日王淮荐福建人留正任成都帅时，赵脊竟说：“非闽人乎？”“闽人不可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楼钥《王淮行状》）王淮向以谦恭爱才、好贤荐士博得士大夫的好感拥戴，平步登上左相宝座，对道学名士折节广交，荐拔最力，在朱熹六劾唐仲友后他对道学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仇视憎恨。原被他大力荐举的道学名士陆九渊、彭仲刚、刘清之、张栻等，一下子都成了他反道学重点打击的对象；另一批由他鼎力荐引的清望名流林栗、徐誥、京镗、许及之等，又摇身一变为王淮党和后来党禁中反道学的

干将。朝臣上下投合帝好，阿顺相旨，一场愈演愈烈的反道学，首先由侍从大臣中的王淮党羽和作为宰相手中驯顺工具的台谏言官们发难。淳熙九年十一月，唐仲友的密友吏部尚书郑丙受王淮指使上了一道奏疏，攻击“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①这是密切配合朝廷保护唐仲友而在同月将唐仲友案犯全部无罪释放采取的行动，朱熹在辞免江东提刑状中说“远而至于师友渊源之所自，亦复无故横肆抵排”，就指郑丙。到淳熙十年王淮又亲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密授他在六月面对时向赵昀进上了反道学的奏章，说：

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不太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邪！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受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动人口实，理学不仅被指为“道学”，而且直视为“伪学”，仿佛陈贾、唐仲友这些大贪污犯倒是“诚”的，而揭露王

^① 郑丙上反道学奏疏向不知何时，史家多笼统系于淳熙十年之下乃误。按郑丙于淳熙十年八月除知绍兴离朝（参《南宋制抚年表》），其上疏反道学早于陈贾，而陈贾上疏反道学在此年六月。据朱熹《文集》卷二十二淳熙九年十一月所上《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有云“远至于师友渊源之所自，亦复无故横肆抵排”，诸家朱熹年谱皆以为指“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先生……故先生奏言及之。”则郑丙上书应在是年十一月。朱熹所云“除书朝下，章劾夕闻”者，即指改除江东提刑与郑丙上书在同时。

淮、唐仲友勾结作恶的朱熹倒是“伪”的，王淮党要比从陈公辅直到谢廓然之流更巧妙地在反“道学”、“伪学”的烟幕下把封建统治者的一切罪恶及其真实的政治目的都掩盖了。“道学”一词本来并无贬义，理学家也多自称理学为道学，南渡以来的反道学的当权统治者本来也不把程学称为道学，而称为“程氏之学”、“专门曲学”、“洛学”等，“道学”作为一种讥贬之称而被统治者所用是在淳熙二年，后来孙应时提到这一事实说：“惟是‘道学’二字，年来上下公共疾之，无能为明主别白言者……原其始，特越中轻薄子立此名目，乙未（淳熙二年）岁流入太学，已而响布中外，方十五六年耳。”（《烛湖集》卷六《上史越王》书五）郑丙、陈贾第一次从反程学转为提出反“道学”，这是南宋统治者从反对历史上的程学进而到反对现实中的朱学的历史转变。但南宋统治者的反道学纯粹是出于政治上打击异己的需要，它同文化学术上的因尊信传统孔孟儒经之说、株守汉唐经学而反对新兴的理学不同，而是面临衰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腐败保守的力量与反对这种腐败统治的进取自救力量（表现为道学清议）之间的矛盾斗争，是代表纯粹借用孔孟的文化躯壳以维护政治上的腐朽苟安统治的官僚力量同士大夫中代表真正复活孔孟的文化精神以挽救腐败社会人心世道的知识集团之间的冲突较量，因而它并不具有古典经学与新型理学的文化学术之争的意义，而具有封建王朝对进步士大夫进行残酷政治迫害与文化专制的性质。

道学（理学）单从哲学史上看也许更多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谬误，然而从人类文化史的长河上鸟瞰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展现自身千年不败的历史活力的一代景观，作为一种不可阻遏的儒家文化新潮，它踏着充满障碍的荆棘之路登上了东方文化历史舞台，显示它的过于乐观的道德主义，我道一体的哲学追求，执著仁爱的人

文精神，沉静达观的理性思辨和进取济世的人生态度，给整个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思维方式直到古老的东方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以新的巨大冲击。然而手握周程铸造的文化杠杆扮演着这一幕文化历史巨变主角的朱熹却缺少自觉意识到这一历史巨变的巨大历史感，在强大的反道学铁壁面前他多少充满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观伤感意绪。南康和浙东的两次“自试”使他感到“吾道难行”，在他的思想上又造成一段新的转折，果斋李公晦说他“守南康，使浙东，有以身殉国之意。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转引自洪本《年谱》）他在精神上又经历了一次退潮和萎缩，向外用世转变为向内观照，呐喊转变为反思，又投入了自我艰难探索前行的思辨怀抱。淳熙十年正月他请祠得遂，主管台州崇道观。世人都以为他从此真的要戡影穷山，做杜门自修、与世相忘的畸人高士了，放翁陆游寄给他五首诗，就在称誉他的高尚其行的同时多少吐露了这种担忧：

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

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蝉蜕岩间果是无，世人妄想可怜渠。

有方为子换凡骨，来读晦庵新著书。

身闲剩觉溪山好，心静尤知日月长。

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

齐民本自乐衡门，水旱哪知不自存。

圣主忧勤常旰食，烦公一一报曾孙。

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崃九折途。

我老正须闲处看，白云一半肯分无？

（《剑南诗稿》卷十五）

朱熹何尝想忘情尘世苍生？退居山林讲学著述不过是他历来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他的喟叹“吾道不行”恰如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绝之言，只是表现了他的更加要百折不回济世行道的忧焚，只不过那种炽热的奋力激越的进击受到他的道学理性主义冷峻深静的节制，又暂时似乎失去了冲击现实的力量。淳熙十年春他破例作了一首《感春赋》吟咏自己从浙东归来后的情愫和幽抱，呈露了他在恬然淡泊的醇儒外貌下的彷徨苦闷而又不平难抑的真实灵魂：

触世途之幽险兮，揽余轡其安之？慨埋轮而繫马兮，指故山以为期。仰皇鉴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犹未替。抑重巽于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还归兮，毕藏英而发春。潜林庐以静处兮，闭蓬户其无人。披尘编以三复兮，悟往哲之明训。嗒掩卷以忘言兮，纳遐情于方寸。朝吾展履而歌商兮，夕又赓之以清琴。夫何千载之遥遥兮，乃独有会于余心……

朱熹弟子说他“忧世之意未尝忘也，作《感春赋》以见意。”很有可能正是陆游读了他寄来的《感春赋》，才作了五首小诗作答，故在诗中担心说“忧公遂与世相忘”。但陆游似乎并没有能透过赋看穿朱熹道学灵魂更深一层充满忧患意识的自我。“尘编三复”和陆游诗中说的读《易》绝编一样都指读儒经，“往哲明训”自然是指孔子的遗

教，“千载会心”是说他的独得千年道统心传，而“美人不见”便是慨叹他的理学不能见用于世了。后村刘克庄后来说朱熹当时已处在“上无人主之知，次无元老大臣之助，下无天下之誉，又值王鲁公（淮）辈当轴秉钩，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别无它法。”（《后村大全集》卷一百零一《朱文公与陈丞相书》）所以朱熹从浙东归来充满人生忧患意识和悯世救道的心境同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归来的心境有惊人相似之处，他也只有做一个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现代“素王”以讲经授徒宣道救世了。《感春赋》成了他转向武夷精舍著述生活的内心独白。

淳熙十年四月，朱熹在武夷五曲构建的武夷精舍落成，那里成了理学“素王”传经讲道的当代洙泗弦歌之地。磅礴雄深的武夷山自北走南，屹然一柱的大王峰下，一条急流萦回九折如带，奔跳于乱石绝壁之间，这就是有名的九曲溪。在第五曲处湍流骤然变为平缓深阔，绿漪荡漾，有一峰如巨屏拔地耸起，这就是大隐屏。武夷精舍就建在屏下丹崖翠壁环拥的平林洲上，那里有数十丈见方的平旷之地，乔木长藤同茂林修竹交相掩蔽。还在乾道五年他驾舟游览便看上了这方胜境，五夫里潭溪离武夷三十里，他常带门生弟子们来五曲讲诵啸咏。这次他在大隐屏下构仁智堂，左建隐求斋，右建止宿寮。另辟竹坞，累石为门，坞内建观善斋，让四方学子群居，门面筑寒栖馆，让羽客道士栖集。山颠建晚对亭，临溪构铁笛亭。前山口筑柴扉，挂上武夷精舍的匾额——名扬天下后世的武夷精舍竟只有这样的粗陋规模。他的弟子蔡沈作诗描绘这个高卧大隐屏蓬莱仙境中的武夷翁说：

寄 朱 晦 翁

武夷群岫高崔嵬，隐屏直耸天中开。

千寻拔地出圭壁，岷岷万古封苍苔。
 烟霞舒卷朝夕异，日月昼夜东西回。
 寒流诘曲抱岩足，水清沙碧真蓬莱。
 紫京真人玉为杯，琼浆初泼葡萄醅。
 醉来披云卧松月，松花点点飘香雪。
 哀猿绝壁声更长，惆怅怀人待明发。

（《武夷山志》卷十）

而诗人南涧韩元吉却在为朱熹作的《武夷精舍记》中描绘这武夷山中弦歌不绝的当代洙泗说：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
 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
 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得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之
 乐，悉为元晦之私也。余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辞
 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
 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五折，负大石屏，
 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草茅，仅得数
 亩，面势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
 弟子具畚锸，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
 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
 莫不在是……

沉浸在这种琴歌酒赋讲学论道的山中之乐中，朱熹感到了一种如同陶渊明归居田园似的跳出官场、脱却宪纲“爰得我所”的欣慰，他写信告诉陈亮说：“武夷九曲之中，比缚得小屋三数间，可以游息。……此生本不拟为时用，中间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归。自近事而言，则为废斥；自初心而言，则可谓爰得我所矣。”但朱熹却

并不想做一个陶彭泽式的田园诗人,更不想当一个服气茹芝的道家隐士,而却是要做一个以倡道为己任的“孔夫子”,韩元吉同样在《武夷精舍记》中把这个不为时用游息山中的道学夫子内圣外儒的灵魂揭示得淋漓尽致: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也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颠,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尝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咏,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幔亭之风,抑又何如也?

“圣人”虽不废游息,但却无时无刻不“志于道”,行用退藏无不以“道”为指归。就在这简陋的武夷精舍,朱熹展开了他后半生的读书、讲学、著述和论战的不平静的生活。淳熙十年四月他作的一组《武夷精舍杂咏》,成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武夷精舍著述时期生活的自我写照,他在《精舍》一首中吟道:

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

在这徜徉山水林泉的武夷精舍生活中,他同命途同样多舛的大诗人、大词人唱酬往返,他的诗作也得到了一次升华,透出了一股田园诗的清峻空灵之气,并且受到武夷山这一方道家蝉蜕仙化的洞天福地的感染,竟也真获得了一种“幔亭之风”;与此同时早年诗中那种对内忧外患的南宋社会忧国忧民的世俗之音与对性理玄思的自我吟唱消失了,代之以因宦海浮沉和反道学打击产生的一种对人生、生命、命运的忧患意识的感喟,但这种人生忧患意识也同样

染上了道家安性自适，甚至是仙家超凡脱俗的晕圈。淳熙十一年二月他作的十首《武夷棹歌》，是他武夷精舍时期的代表作，也成了他生平诗歌创作达到高峰的象征：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
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
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道人不复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露碧毵毵。
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
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

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萦洄。

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文集》卷九）

在宋代俗文学从里巷都市汹涌兴起的潮流冲击下，贵族诗人固守的刻板典雅的文学庙堂动摇了，朱熹又更多具有世俗平民诗人的气质，为反对死气沉沉的江西诗派和晚唐风转而面对这一股民歌乐府和民间文学的清新空气，他也像欧阳修一样好采鄙言俚语融化入诗，好作俗体，作俳谐体，作六言诗，作五七言杂诗，作回文词，以俗入雅，正同有文体解放意义的语录体的盛行一样，蔚成一股风气，以至“晦庵先生回文词，几于家弦户诵矣”。（《读书续录·朱熹词》，《历代词话》卷七）邹祗谟甚至把他同东坡并提说：“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回文》）这十首武夷棹歌采用从一曲写到九曲的写法，正是典型的民歌乐府风貌，隐然从民家的船歌渔唱融化而来，但另一方面又显然是深受欧阳修有名的《鼓子词》的启发。朱熹从小受朱松陶冶也特别爱好欧阳修乐府，他曾特地把欧阳修的《鼓子词》大书赠给同窗诗友黄铫。^①

① 《历代词话》卷八《黄铫渔家傲》：“朱晦翁示黄铫以欧阳永叔《鼓子词》，盖所以讽之也。铫赋《渔家傲》云：‘永日离忧千万绪。霜舟远泛清漳浦。珍重故人寒夜语，挥玉麈，沉沉画阁凝香雾。风砌落花留不住。经蜂翠蝶闲飞舞。明日柳阴江上路，云起处，苍山万叠人归去’。”《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四此词题下去：“朱晦翁示欧公《鼓子词》，戏作一首。”